

唐君毅與余英時的交往(下)

● 彭國翔

編者按：本文第一至三節已於2023年8月號刊出；本期刊出第四至五節。

四 1971-1978：余英時重返新亞和唐君毅的晚年

余英時重返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擔任校長一事的經過，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971年之前，很可能唐君毅已有考慮甚至已經向余英時提起。但是在唐君毅的文字中，正式提及他向余英時發出邀請，則是在1971年，也就是余英時離開香港十六年後重返新亞訪問的時候。余英時經過考慮之後接受，是在1972年，但只答應兩年的任期。至於正式履職，則是在1973年。而1973至1975這兩年擔任新亞校長並輪值擔任中大副校長期間，余英時正好遇到港英政府和中大校長李卓敏全力推動的由「聯合制」向「單一制」改革的關頭，於是發生了所謂的「改制風波」。

在這一事件中，唐君毅和余英時的立場產生了分化。這一點，大概也是迄今為止關於兩人之間最為人所知的事件了。但是，余英時如何就任新亞校長？此事與唐君毅有何關係？恐怕是鮮為人知的。即使是對於「改制風波」這一似乎較為學界所知的事件，應該如何理解唐君毅和余英時在其中所處的位置和扮演的角色，也有釐清的必要。

1971年8月，余英時重訪闊別十六年的新亞。在唐君毅的《日記》(引用只註冊次和頁碼)中^①，僅在8月一個月之中，便在18、19、23和25日這四天的記錄裏都提到了余英時：

十八日 晴 上午開會，下午寫文三千字，參加哲學翻譯會，梅貽寶約晚飯，飯後與余英時、孫國棟談校中事。

十九日 晴 上午研究所開會，下午續文三千餘字，約余英時、孫國棟晚飯。

廿三日 晴 上午辦公，下午余英時講演，黃夢花約晚飯。

廿五日 晴 上午開會，下午研究所約余英時茶會，夜看京戲。（《日記》，下冊，頁191）

在此之前，唐君毅3月22日已經有一函給余英時^②。如本文上篇所述，在如今唐君毅的《書簡》中並沒有收錄給余英時的信，這封信的內容無從得知。但根據當時的情況，信中很可能接續1970年和余英時在美國的見面，涉及後者返回香港擔任新亞校長一事了。

根據上引唐君毅《日記》，在8月他和余英時的四次會面中，兩次都有中大歷史系主任孫國棟（1922-2013）參加。這進一步表明，當時他們談論的話題，已經有可能涉及新亞繼任校長一事。之所以如此推斷，是因為接任校長最初考慮的人選，正是孫國棟。不過，孫國棟在書院內部並未被接受。而作為新亞三位首屆畢業生之一，且當時已經成為哈佛大學正教授的余英時，在中大那樣一所仍然偏重留洋背景和英文能力的學府^③，顯然各方面都是出類拔萃、深孚眾望的。

對於這件事情，余英時後來在《余英時談話錄》（以下簡稱《談話錄》，引用只註頁碼）^④回憶說：

那時候錢穆先生已經去了台北，我回去看到的老師是唐君毅先生、吳俊升先生。他們就談到讓我回去當新亞書院校長。他們知道我的興趣不在行政，當時想把新亞書院校長傳給歷史系的主任，也是我的朋友孫國棟先生。但是當時孫國棟先生還不能馬上接任，資格還是淺一點，希望我代兩年，再傳給他。在這個條件之下，我才答應回來。（《談話錄》，頁42-43）

孫國棟比余英時大八歲，但是1955年始入錢穆門下，比余英時晚入門五年，加之學術成績較余英時遜色，所以余英時說他「資格還是淺一點」，並無不妥。因為「資格」、「資歷」從來就不只是單純關乎年齡。

1971年這一次余英時初返新亞的時候，恰逢劉述先也由他任教的南伊利諾大學休假一年，到新亞擔任講師。兩人之前在美國早已經見過面，彼此相識^⑤。對於當時余英時在新亞的情況，劉述先曾經從一個觀察者的角度這樣寫道：「我在新亞的時候，正好余英時兄來訪。面對錢先生、唐先生等老師，他的態度十分謙抑。他做了一次演講，提出清初思想轉往經學有學術內部的原因的說法，只謂這是對前輩意見的一個小小的補正。」^⑥

1971年8月，錢穆人在台北。這一點上引余英時的回憶也有提到。所以，劉述先此處「面對錢先生」的話應該是誤記了。但是，「面對唐先生」的話倒是可以和唐君毅《日記》以及余英時的回憶相互印證。此外，對於唐君毅8月23日日記中「下午余英時講演」這句話，劉述先的回憶也能起到補充的作用。所謂「提出清初思想轉往經學有學術內部的原因的說法」，應該就是余英時講演的內容，也是其〈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那篇文章的主題^⑦。

緊接着上引的那句話之後，劉述先還從親耳所聞者的角度，記錄了頗能反映余英時內心世界的一句話。他說：「新亞招待我們兩家去落馬洲，眺望大陸，影影綽綽可以看到解放軍的活動。神州大地就是如此可望而不可即。我記得那時英時兄講了一句語重心長的話：『我們的心永遠在那一邊！』這道盡了流亡海外的中國知識份子內心感受的心酸。」^⑩劉述先之所以特別記下余英時的這句話^⑪，顯然因為它可以說同樣是他自己的心聲。惟其如此，「道盡了流亡海外的中國知識份子內心感受的心酸」這句情見乎辭的話，也才會見之於劉述先的筆端。

8月在和余英時的幾次晤面中，唐君毅很可能和余英時談了請其返回新亞擔任校長一事。不過，要到10月，此事才出現在唐君毅的《日記》之中。那時，余英時已經返回美國了。唐君毅1971年10月8日和9日兩天的日記是這樣寫的：

八日 晴 上午午會，我講沈燕謀先生生平十餘分鐘，覆余英時一函談請其任校長事。

九日 晴 上午上課二時，中午梅貽寶約與吳士選、沈亦珍共談余英時任校長事，晚標點文。（《日記》，下冊，頁194）

從10月8日「覆余英時一函談請其任校長事」的語氣來看，可以斷定唐君毅之前曾和他談過此事。而由「覆函」之語，也可知10月余英時已經離開了新亞。錢穆離任新亞校長之後，第二任校長是吳俊升（字士選），任期是1965年7月至1969年6月；第三任校長是沈亦珍，任期是1969年7月至1970年8月；梅貽寶則是第四任校長，任期是1970年9月至1973年6月。因此，唐君毅10月9日「梅貽寶約與吳士選、沈亦珍共談余英時任校長事」的記錄，足見此事至少在新亞管理層方面已經基本確定，不再只是唐君毅的個人想法了。事實上，余英時1973年7月正式到任之時，梅貽寶便從校長的位子上退了下來，顯然是事先商定的結果。這一點，余英時自己也回憶說，「一九七三年，我到香港，新亞書院剛搬到馬料水，就是現在的香港中文大學校園。我的前任新亞書院校長是梅貽寶先生。梅先生是老資格了，七十多歲，從美國退休了，做了兩年校長。本來還可以長做，因為我去的關係，他就早退了」（《談話錄》，頁44）。

由上可見，余英時接任新亞校長事，1971年10月在新亞管理層已經達成共識。但是，由於當時新亞屬於中大的一部分，還需要經過一系列的官方程序才算正式確定。這一系列的程序是在1972年完成的。對此，唐君毅的《日記》中也有明確的記錄。1972年元旦，他寫道：

一日 晴 上午學生來談，中午大專校教授聚餐。下午睡，覆余英時一函。（《日記》，下冊，頁200）

這封回覆余英時的信有何內容，雖然無從得見，但就上述的歷史背景而言，余英時接任校長一事，必定是其主要的內容。果然，在接下來的2月10日，此事便正式進入了操作的程序。唐君毅這樣寫道：

十日 晴 上午上課一時，學務會報，中午研究所同仁聚餐，餐後開會，又過海開董事會、校長遴選會，決定請余英時擔任校長，晚校對文四時，今日為我六十三歲生日，略備果蔬祭祖。（《日記》，下冊，頁202）

從這裏的記錄來看，既然已經「開董事會、校長遴選會，決定請余英時擔任校長」，余英時接任校長事至此正式確定。此日恰好是唐君毅六十三歲的生日。

不過，事情似乎還沒有全部結束。因為在5月12日的日記中，唐君毅又有如下的記錄：

十二日 陰 上午研究所會，討論研究所一九七四後四年計劃，下午開教務會議、校務會議，接受並討論余英時任校長事。（《日記》，下冊，頁208）

由此看來，1972年余英時就任新亞校長的官方程序包括兩個環節：2月10日這天，應當是最重要的官方環節，此事在新亞董事會和中大校方的層面獲得了最終的正式認可；而5月12日這天，應當是在書院的層面確認此事。這裏所謂「校務會議」，當指新亞的校務會議。從「接受」的字眼來看，余英時任校長事已經在中大校方走完了程序，只待書院方面「接受」。從「討論」的字眼來看，對於「接受」與否，書院最後仍可以有自己的意見，但由於之前進行了長期和充分的準備工作，書院內部管理層已經獲得共識，「討論」只具有程序上的形式意義，而「接受」校方通過的正式決議，才是這一環節在程序上的實質內容。6月8日，唐君毅曾有一函致余英時（《日記》，下冊，頁209），應當是在校方正式的公函之外，以私人身份將結果告知余英時。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人事往來的常見做法。

總之，從1970年甚至之前開始醞釀，到1971年余英時返回新亞和唐君毅當面商談，余英時接任母校校長一事，在1972年終於正式敲定。這件事的促成，可以說唐君毅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如所周知，新亞三位創校元老是錢穆、唐君毅和張丕介，首任校長是錢穆，於1965年引退，張丕介1970年辭世，因此，從1960年代後期開始，新亞資格最老、最有影響力的無疑是唐君毅。雖然他並未繼任校長一職，但錢穆之後的幾任校長，包括吳俊升、沈亦珍和梅貽寶，在新亞的影響力顯然是不能和唐君毅相提並論的。可以說，錢穆之後，唐君毅實際上已經成為新亞的精神領袖。也因此，余英時繼任校長一事，可以說是唐君毅一手促成的^⑩。這不僅是因為余英時是新亞的首屆畢業生，當時在美國取得了崇高的學術地位，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乃在於余英時對作為師長的唐君毅的態度。無論是唐君毅訪美期間余英時的盛情接

待，還是余英時返回新亞之後對待唐君毅仍以師生之禮相待，用劉述先的觀察來說便是「十分謙抑」，不能不使唐君毅在考慮新亞校長人選時首先會想到余英時。不過，從余英時接任之後，兩人的交往從此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不再是簡單的師生關係了。

1972年8、9兩個月，余英時仍在新亞。在8月29日、9月9日和9月13日三天的日記中，唐君毅都有提到余英時：

〔8月〕廿九日 晴 上午到校辦公，下午閱佛經，並改寫論禪宗文千餘字，余英時、孫國棟來談。

〔9月〕九日 晴 上午到校辦公，下午余英時在研究所所會講話^①。

〔9月〕十三日 晴 上午上課二時，下午閱 Bergman 書，晚約商學院理學院同事十餘人在家便飯與余英時晤談。（《日記》，下冊，頁216）

從這裏的敘述尤其是「余英時在研究所所會講話」的記錄可見，他在8、9月已經進入了準備接任校長的狀態。不過，他當時是向哈佛告假兩年，履行返回新亞服務的承諾，並未打算長期擔任校長。

對於1971至1972這兩年間有關接任書院校長一事，余英時自己說得很清楚：

一九七一年我去新亞書院接頭，一九七二年才決定，我回到哈佛大學才知道有兩年的期限，過了兩年就得辭職了。於是，我向哈佛大學請假兩年，不拿薪水。當時哈佛還很客氣，後來哈佛就比較嚴格，只能請一年假了。（《談話錄》，頁43）

因為我離開新亞書院的時候，跟他們有口頭約定，他們送我去哈佛大學念書，我應該回來服務兩年。這個約定到十六年以後才實現了。我把這個債還了，為學校工作兩年。當時我說得很清楚：我不會長期做新亞書院校長。（《談話錄》，頁43）

我接任新亞書院校長，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做過渡。雖然他們認為我過渡一下也許會長期做下去，實際上我的心思很定。（《談話錄》，頁42）

從「一九七一年我去新亞書院接頭」的話來看，也可推知此事在1971年之前已有頭緒，否則談不上「接頭」。但是，余英時不僅一開始就沒有打算長期擔任行政職務，後來李卓敏曾經不止一次表示希望余英時能夠接任大學校長一職，余英時也回絕了（《談話錄》，頁53）^②。如果他長期從事行政工作，恐怕會和唐君毅一樣，學術工作不免受到影響。而要想學術與行政兩邊兼顧的話，就難免給自己帶來身心上的巨大耗損。對此，余英時具有高度的自覺。他說：「權力對我毫無意義，我做了兩年新亞書院校長，自知與性情不合，便斷了搞行政的念頭。那時候我才四十幾歲，若把學問丟掉，處理人事，那是捨己之長，用己之短，浪費我的真生命。」（《談話錄》，頁62）

雖然余英時1972年已經決定接受新亞校長的職位，並進入準備狀態，但他正式接任，則要到1973年7月。在唐君毅1973年7月的日記之中，有關余英時的記錄就有六條：

十六日 晴 上午擬參加中日學會論文稿大綱。下午至中大開會，晚約余英時、孫國棟晚飯。

十九日 陰 上午行政會報，覆張鍾元一函，中午與梅貽寶、余英時同午餐談校中事，下午許濤來談教育文化基金事。

廿一日 晴 將昨文寫提要二千字，下午睡，晚校中宴余英時。

廿五日 晴 上午到校辦公，下午校文，與王道太太一函，晚校中宴梅、余二校長。

廿七日 晴 上午至中大口試學生至下午五時歸，晚余英時來談。

廿八日 晴 覆Barnical一函，下午送梅貽寶去台，與余英時、吳士選、李祖法共商校中事並同晚餐。（《日記》，下冊，頁234）

7月16日唐君毅「約余英時、孫國棟晚飯」，應該是唐君毅個人給余英時接風洗塵，孫國棟作陪。19日中午「與梅貽寶、余英時同午餐談校中事」，25日晚宴稱「梅、余二校長」，則說明梅貽寶和余英時已在交接狀態，余英時即將正式接任新亞校長。27日「晚余英時來談」，以及28日唐君毅「與余英時、吳士選、李祖法共商校中事並同晚餐」，表明余英時已經進入工作狀態。至於21日「晚校中宴余英時」，則應該是中大和新亞校方以官方名義對余英時到任的歡迎宴請。總之，從1973年7月唐君毅日記中關於余英時的頻繁記錄來看，余英時已經正式開始了他新亞校長的職務。

在1973年7月以後的日記中，唐君毅幾乎每個月都有和余英時往來的記錄^③。如8月有兩條記錄，其中25日這天，來訪唐君毅的不僅是余英時自己，還有余夫人陳淑平。

二日 晴 上午到校辦公，下午睡，晚孫國棟、余英時來談。（《日記》，下冊，頁235）

廿五日 陰 上午到校辦公，下午余英時夫婦來。國鈞約晚飯。（《日記》，下冊，頁236）

10月18日，有余英時請唐君毅午飯的記錄：

十八日 陰 上午上課一時，余英時約午飯，下午至研究所。（《日記》，下冊，頁241）

11月23和28日這兩天，則有余英時父親余協中的記錄：

廿三日 晴 上午至研究所辦公，余協中來，下午準備明日課。

廿八日 晴 上午閱 Kneale 書六七十頁，下午再閱數十頁，晚約余協中父子等及新亞同仁晚餐。(《日記》，下冊，頁243)

而到了12月，又有兩條關於余英時的記錄：

二日 晴 上午參加研究所及文學院講演會，由余英時講演，下午閱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中論 Infinity 及 Continuum Principle 之二節。(《日記》，下冊，頁243)

五日 晴 補前日文四千餘字，晚與李祖法、吳士選、余英時共談校中事。(《日記》，下冊，頁244)

12月2日余英時的講演，由書院的研究所和文學院聯合舉辦，是「中國文化講座」的第二講，余英時的講題是「史學、史家與時代」。5日晚唐君毅和余英時「共談校中事」，則恐怕是余英時1973年就任新亞校長以來和唐君毅交往過程中最為常見的狀態了。而由以上唐君毅《日記》的記錄可見，在1973年，兩人的交往不限於公事，還有私人的往來。並且，雙方的家人也有交往。可以說，唐君毅和余英時在這一年的相處應該是相當愉快的。這裏的關鍵在於：一方面，余英時接任一事，幾乎是唐君毅一手促成，這當然說明唐君毅對余英時是既信任也看重的；另一方面，余英時最終接受這一職位，既是出於他對母校的感情，也意味着對作為師長的唐君毅的大力支持。

不過，余英時擔任新亞校長不久，就立刻被推到了書院改制的風口浪尖。上篇已經提及，自從1963年新亞書院、崇基學院、聯合書院一道成立了聯合制的中大，無論是港英政府的現實考慮，還是大學運營的實際需要，從聯合制向單一制的轉變就已埋下伏筆、蓄勢待發。而余英時之所以被推到風口浪尖，就在於他接任新亞校長不久，適逢新亞校長輪值擔任中大副校長；而當時李卓敏又將負責改制一事交到余英時的手上。這一點，余英時晚年回憶時講得很清楚，他說：「當年新亞、崇基、聯合的校長是輪流做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一九七三年正好輪到我當副校長。如果不是因為當副校長，學校改革的事情就不會搞到我頭上。」(《談話錄》，頁47)

如何理解新亞改制風波以及唐君毅和余英時因此事而產生的分歧，後文會有專門的討論，這裏還是先對兩人的交往進行歷史的重建，以便為盡可能客觀和平情的理解提供必需的穩固基礎。

余英時到任的第二年，也就是1974年，在唐君毅《日記》的2月、3月、5月、6月和8月這五個月中，各有一次的記錄，分別如下：

[2月]廿一日 晴 上午上課一時，中午與余英時、嚴耕望、全漢昇、孫國棟共商研究所事，下午校孔子誅少正卯問題重辦文。(《日記》，下冊，頁249)

[3月]十九日 陰 上午上課二時，下午與余英時、孫國棟、全漢昇談研究所事。(《日記》，下冊，頁251)

〔5月〕廿三日 晴 上午在家休息，下午新亞教育文化會及新亞董事會。與孫國棟、余英時同晚飯談校中事。（《日記》，下冊，頁254）

〔6月〕十一日 晴 上午寫信二封，並至研究所。下午與沈亦珍、吳士選、李祖法、余英時同商吳士選所擬致教育部函，言新亞研究所將改隸新亞教育文化公司之函。並同晚飯談校中事。（《日記》，下冊，頁256）

〔8月〕十六日 晴 終日校文，余英時約晚飯。（《日記》，下冊，頁260）

在這五個月的五條記錄裏，前四次中儘管也有吃飯（後兩次），但四次都是「談校事」或「談所事」的。唯有最後一次只記了吃飯，並沒有談事情的記錄。事實上，在整部唐君毅的《日記》中，除了1977年11月，也就是唐君毅臨終前三個月，記錄了余英時曾經去探病之外，1974年8月16日這一天余英時約唐君毅吃飯，是兩人最後一次見面並吃飯了。

需要指出的是，1974年5月，唐君毅和牟宗三（1905-1995）雙雙正式從中大退休^⑭。改制一事，按理說已經與唐君毅無關。但是，唐君毅畢竟是新亞創校人之一。如前所述，尤其在1965年創校校長錢穆引退之後，唐君毅一直是新亞的精神領袖。因此，儘管他已退休，改制一事仍與其息息相關。而由上引唐君毅《日記》可見，余英時在唐君毅退休之後仍與其商議校事。此外，新亞研究所7月脫離中大，獨立運作。上引唐君毅6月11日所謂「新亞研究所將改隸新亞教育文化公司」，說的正是新亞研究所脫離中大一事。而其時余英時仍然參與其事，說明他並未因改制事與唐君毅決裂。8月16日他約請唐君毅晚飯，也顯示了他對唐君毅最大程度的誠意和尊重。《日記》中未再記錄兩人談及校事、所事，應當是因為改制大局已定，而新亞研究所脫離中大，也意味着唐君毅所代表的新亞元老，只能以這種方式保留他們的意見了。

1974年9月5日，唐君毅寫道：「五日 晴 上午擬研究所文化講座計劃，下午至沙田與劉述先談招待Barnical事，參加APC會，此為我在中文大學之最後一次會議。」（《日記》，下冊，頁262）這裏所謂「我在中文大學之最後一次會議」，與其說是事實陳述，不如說是情緒表達，因為他並未真的從此不再參加任何中大會議。例如，10月28日記載：「廿八日 晴 上午至研究所辦公，下午新亞校長遴選委員會開會。」（《日記》，下冊，頁267）這裏「新亞校長遴選委員會開會」顯然並非和中大無關的會議。同時，由此也可以看到，余英時並未打算留任，而是去意已決。因此，新亞在10月已經開始考慮下一年余英時去職之後的校長人選了。事實上，改制風波讓余英時身心俱疲，他甚至在任期未滿之時已有辭職的打算。只是辭職於事無補，眾人勸說，他才勉強留任至期滿而已。

唐君毅晚年除了上述種種之外，其身體狀況亦需略加補充說明。1966年4月1日，他查出視網膜脫落，此後曾去日本、菲律賓和美國治療多次。1976年8月11日檢查出肺癌後，更是一直與病魔搏鬥，直至1978年2月去世。唐君毅患肺癌固然更多與其常年抽煙的習慣有關，但之前的改制風波對其身心也不能說沒有很大的負面影響。不過，改制大局已定之後，他便將全副精神轉至獨立於中大的新亞研究所。1974年9月，他曾特意到台灣解決新亞研究所畢業

生學歷認證事宜^⑮。1975年4月，則聘請牟宗三、徐復觀和吳俊升為新亞研究所教授，使得現代新儒學的陣營由中大的新亞書院轉到獨立於中大的新亞研究所^⑯。在盡力治療癌症之外，唐君毅又將全副精神放到處理後事尤其是最後校訂其《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一書上^⑰。可以說，改制風波雖然對唐君毅有很大的影響，但事過之後，特別是在檢查出身患癌症之後，唐君毅並未再對此耿耿於懷，而是一面嘗試各種方法與疾病賽跑，一面全力完成自己平生的哲學思考。這就是唐君毅的晚年生活。

五 唐君毅和余英時關係的解析

上文對唐君毅和余英時的交往進行了歷史的重建。以此為基礎，文章最後的部分希望能對兩人之間的關係做出較為全面且合情合理的解析。

(一) 師生關係

學界一般都知道余英時有兩位業師，一位是他在新亞求學時期的錢穆，另一位是他在哈佛求學時期的楊聯陞。當然，在中國文化的世界裏，師生關係是沒有英文時態意義上的過去式的。對余英時來說，兩位都始終是他的老師，並不僅僅屬於某一個歷史階段。不過，就「業師」二字的本意來看，唐君毅也可以說不折不扣是余英時的老師。

正如本文上篇所述，根據《余英時回憶錄》，余英時在新亞求學時期正式修讀過唐君毅開設的西方哲學史課程。余英時也表示，唐君毅當時在思想上對他的影響僅次於錢穆；除了錢穆之外，在學術和思想兩方面，唐君毅對他的啟發是既深且遠的。因此，無論是從修讀過課程這一客觀事實來說，還是從余英時自己的表述來看，唐君毅和余英時之間都毫無疑問是師生的關係。也正是因此，無論是1978年唐君毅辭世之際余英時所獻的輓聯，還是2008年唐君毅銅像落成前一年余英時撰寫的銘文，落款處余英時都自稱「門人」^⑱，就是自然而然、毫不奇怪的。並且，這也再清楚不過地表明，在余英時的心目中，他始終是將唐君毅作為老師看待的。雖然余英時明確表示自己未能追隨唐君毅形上思維的道路，這可以說和他撰寫〈錢穆與新儒家〉是一脈相承的，但是，余英時從來沒有否認過他和唐君毅之間的師生關係。

這一點雖然非常清楚，但學界以往知者不多，因而特別需要指出。之所以知者不多，一方面是很多人對於1950至1955年兩人同在新亞的那段歷史並不熟悉，另一方面多半是受到余英時所撰〈錢穆與新儒家〉一文的影響，認為錢穆、余英時都是自覺與新儒家劃清界線的。對此，後文會有分析。但這裏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唐君毅和余英時之間的師生關係這一歷史事實，如此方可為進一步解析兩人之間的關係奠定基礎。

其實，唐君毅之所以想到請余英時接掌新亞、余英時之所以接受這一職位，都是首先基於這種師生關係。如前文所說，余英時接任一事可以說是唐

君毅一手促成的。如果沒有相當的信任和好感，即便余英時如何傑出，唐君毅也未必會以他作為校長人選。從余英時方面來看，他當時已經是哈佛的正教授，顯然是楊聯陞在哈佛的接班人，如果不是出於對母校的感情，也未必就會接受唐君毅和母校的邀請。況且，一個人對母校的感情往往並不是抽象的，更多地體現在對母校和與自己有關的人物特別是老師的感情上面。那個時候，錢穆早已離開了新亞。如果余英時對母校的感情只繫於錢穆一人，他也不會欣然接受。就此而言，可以得出結論：至少在改制風波之前，唐君毅和余英時兩人之間的感情，雖然未必能達到錢穆、楊聯陞和余英時之間那樣的程度，但應該還是很好的。無論是唐君毅訪美期間余英時的盛情接待，還是余英時1971年初返新亞訪問時對唐君毅「十分謙抑」的態度，均可為證。

新亞改制一事，對兩人之間的關係不能不說產生了負面的影響。事件中站在支持改制一方的劉述先，曾經有這樣的回憶¹⁹：

英時兄對新亞的利益大力維護，中大改制，校產方面新亞貢獻得最少，人員方面新亞裁剪得也最少。英時兄有一次滿帶淒苦之情向我埋怨說，我們在前線打仗，不想背後卻挨刀子，那樣的痛苦實不足為外人道。英時兄任滿，新亞在九龍樂宮樓開歡送宴會。我坐在另一桌，快散席時我過去問他，車上有沒有空位可以帶我回中大。淑平嫂說，今晚他喝多了，不能與他談事情了。我說我沒有什麼要緊事，就另外找了一位同事帶我回家。第二天才聽到，原來英時兄是坐國棟兄的車赴宴的。出來之後國棟兄要去停車場取車，英時兄喝了四大杯白蘭地，被風一吹，酒湧上來，他撐不住，坐在路邊，悲從中來，不禁痛哭失聲。幸好當時沒有記者在場，否則可成了大新聞。上了國棟兄的車之後，在途中吐了出來，還說了句俏皮話：「現在可都還給你們了。」

從這裏劉述先所記的故事來看，當時余英時倍感委屈的心情躍然紙上。所以，1975年余英時卸任離去，實在可以說是一種解脫。余英時離任之際，劉述先可以是新亞校長的繼任人選，但他也堅決拒絕了接任校長的可能²⁰。

不過，1978年唐君毅去世時，余英時敬獻了一副輓聯，內容如下²¹：

當年哀花果飄零，道本同歸，仁為己任；
百世重人文教化，我豈異趣，久而自傷。

敬獻輓聯這一行為本身，便表明余英時並未因之前改制一事而與唐君毅決裂。事實上，上篇已經提及，就在改制事後不久，1977年11月余英時赴港接受中大授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時，便曾和唐君毅的弟子唐端正一道，專程看望病中的唐君毅。前文未及的是，此事《談話錄》未記具體時間，但唐君毅1977年11月6日日記載：「六日 晴 校讀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一書，唐端正、余英時來。」（《日記》，下冊，頁349）由此可知，余英時所記1977年看望唐君

毅的具體日期在11月6日。這是在唐君毅生命結束的前三個月，應該也是余英時最後一次和唐君毅見面了。這次探望和次年唐君毅去世時敬獻輓聯一樣，當然也意味着余英時並未因改制一事而耿耿於懷。

有一個古今中外的經驗事實：被與自己不相干的人誤解，往往並不會產生委屈之感，而愈是被自己信任和有感情的人誤解，產生的委屈往往愈是強烈。據《余英時訪問記》，對於當時改制一事，余英時有如下的敘述^②：

我在新亞改制出問題時，徐復觀是很支持我的。他特別打電話告訴我：他們在背後算計你了，你要小心了。唐先生在背後找學生來算計你了。後來我告訴唐先生，唐先生問：誰說的？我說消息來源我不能告訴你。徐復觀叫我不能辭職，一辭職就上當了。其實我是想辭職的，但是一時也走不掉。後來事情過了。我繼續做到年底完了就走了，因為那時只剩幾個月了，我的契約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契約，新亞董事會也不好意思讓我走。總而言之，香港中文大學改革的事情上，徐復觀了解得比較客觀。他認為他們把我當敵人看待是不公平的。他也知道我想給新亞維持一個獨立的地位，但是跟他們的想法不一樣，這中間有誤會。他對我有同情。他是新亞研究所的研究員，跟唐先生在一塊，知道唐先生背後找學生貼我的大字報。

這段話雖然是說徐復觀的，卻也透露了當時改制風波的情況。這裏恐怕確有誤會，因為據唐君毅的學生回憶，貼大字報攻擊余英時，多是他們情緒激動之下的自發行為，並非唐君毅的授意；相反，唐君毅還特別叮囑他們要對作為師輩的余英時表示尊重。例如，劉國強曾說：「改制的時候，學生中，我是寫多篇反對文章的一位，但沒有一篇是君毅師要我寫的，並不像一些人以為的是君毅師在鼓動學生。」^③劉伍華則說：「唐師雖因中大改制之事而跟某些人士意見不合，但他從來未有就私人方面攻擊這些人；反之，他曾對我說：『這些人在中大仍算是你的老師，在事上可以據理跟他們力爭，但就輩分及關係上仍當對他們尊敬。』」^④

但無論如何，當時彼此之間的誤會還是產生了。所以晚年余英時說：「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兩年，主要壓力是來自新亞老人，因為老人覺得他們的方式是最好的方式。最好不要動了。」（《談話錄》，頁55）這樣看來，余英時給唐君毅的輓聯中「百世重人文教化，我豈異趣，久而自傷」這句話，可以說正是其心情的流露。「久而自傷」一語，不能不說包含着基於委屈的傷感。至於「我豈異趣」一語，固然是心迹的表白，即告訴唐君毅自己並未與之「異趣」，而是「同道」；並且，可想而知的是，余英時的這種表白在改制事件中一定以各種形式向唐君毅傳達過無數次。但與此同時，這句話中所包含的委屈之情，也是溢於筆端，筆者如今讀到都不免感同身受。

就改制一事來說，在余英時看來，既要新亞作為中大的組成部分得到港英政府的全額資助，又要新亞完全獨立運作，不受中大校方的管束，這是無

法實現的。對此，余英時回憶說：「唐君毅先生也不是自私。他有一個理想，跟自己的意志是連在一起的。所以，他不能受殖民地政府的支配，要盡量完全獨立：政府最好給錢，我怎麼辦這個學校完全是我的責任。這個是做不到的。」（《談話錄》，頁50）此外，唐君毅1974年5月已經正式退休，而余英時不論作為中大副校長、改制小組組長還是新亞校長，無論按照常理還是就其實際行政工作的繁忙來說，都不可能事無鉅細直接再向唐君毅個人匯報。這種情況下兩人之間的溝通出現問題，引起彼此之間的誤解，也是完全可以想像的。正如余英時晚年自己所說：「後來，唐先生也不來找我了，本來他應該找我。如果真有問題應該找我商量。我做校長不能事事去向他們請示，那做什麼校長呢？沒有獨立性，我的性格做不到這一點。我有什麼事情都報告給董事會，也沒有半點隱瞞。我把我們的意圖表明：希望保持相對的獨立，同時跟香港政府取得諒解。」（《談話錄》，頁50-51）

事實上，余英時領導的改制小組制定的方案，還是盡可能為新亞爭取較大的自主權。所以最後港英政府也沒有採納改制小組提供的方案，而是另起爐灶，最終以立法的方式確立了完全單一制的組織結構，從此書院僅具有分配學生宿舍等生活方面的職能，無論在人事、財務乃至教學方面的權力，都被大學校方拿走了。

關於新亞改制風波的來龍去脈，以往相關的文字已有不少^⑳。本文既無需重複考察此事，所要分析的重點也不在於這件事本身，而是此事對唐君毅和余英時兩人關係造成的影響。由以上分析可見，當時被部分新亞人士視為大叛徒的余英時^㉑，其心中委屈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從1977年11月余英時專程去探視病中的唐君毅，到1978年2月唐君毅逝世時余英時敬獻輓聯，再到2008年為次年在中大落成的唐君毅銅像撰寫銘文，稱讚唐君毅「風雨如晦，花果飄零，神州哲理猶能續慧命於海隅，先生之功莫大焉」^㉒，尤其是晚年肯定新亞求學期間唐君毅對自己的影響僅次於錢穆，都足以表明余英時固然承受了誤解和委屈，卻並未因改制風波而在感情上斷絕與唐君毅的關係。

或許有人會說，既然余英時與唐君毅有師生的名分，兩人之間的關係比余英時和牟宗三、徐復觀要密切，那麼為甚麼牟、徐兩位辭世之際，余英時都撰寫了紀念文章^㉓，而唐君毅辭世之際，余英時只有輓聯卻無文章呢？對此，或許可以這樣理解：唐君毅去世時，新亞改制事件剛過去不久，余英時如果要寫專門的紀念文字，改制一事恐怕是無法迴避的。但此事無論對唐君毅還是余英時來說，都是一件令人不愉快的憾事，尤其難免會勾起余英時心中的委屈之情。因此，余英時敬獻輓聯之外，不再撰寫紀念文字，正是他心存厚道、不欲讓昔日的遺憾再度泛起的表現。事實上，即使刻意不再回首往事，以保持對唐君毅作為師長的敬意，由前文對於輓聯的分析可見，余英時內心的複雜情感，在其輓聯中也難免有所流露。

如前所述，唐君毅在改制已成定局之後，也不再糾結此事，轉而全力經營獨立的新亞研究所；在獲悉身患絕症之後，更是將精力放在料理後事和校訂書稿之事上。至於唐君毅在1977年11月6日的日記中專門記錄了余英時前

來探望這件事，無疑表明他對余英時已不再心存芥蒂。此外，在整部唐君毅的《日記》中，也未見他因改制一事而對余英時有多少批評。

總而言之，由於新亞改制的風波，使得唐君毅和余英時之間原本完全相互信任的師生關係受到了一定的影響，未免遺憾。但是，這並未導致兩人關係的破裂。進一步來說，如果將兩人之間的關係放到一個更大的脈絡與背景之中，從文化立場與價值認同的角度予以觀察和分析，對於他們之間的關係，當會有更為全面和恰當的理解。

(二) 文化立場與價值認同

余英時在1991年發表〈錢穆與新儒家〉，引起海內外學界的廣泛討論²⁹。究竟應該如何解讀這篇文章？尤其是如何由該文涉及的問題理解唐君毅和余英時的關係？恰恰需要從文化立場與價值認同這樣一個更大的視角去觀察，方可有恰當的回答。

余英時撰寫〈錢穆與新儒家〉一文的目的，是要將錢穆與唐君毅、牟宗三所代表的「新儒家」劃清界線，同時也意味着自己不願被納入新儒家的陣營。不過，早在余英時撰寫此文之前，1986年中國國家教育委員會「七五」規劃在將「現代新儒學思潮」確定為重點研究項目之一時，不但將錢穆包括在內，也將余英時作為其中之一。這說明在廣大的中國知識界看來，錢穆和余英時不僅學術思想的主要領域和貢獻在儒學，其文化立場和價值認同也是儒家的。就此而言，他們和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以哲學為專業的新儒家並無根本的不同。而在余英時的文章發表之後，劉述先更是從這一角度詳細論證：無論從文化立場和價值認同來看，還是就學術思想的主要領域和貢獻而言，錢穆都可以被稱為「新儒家」³⁰。劉述先不僅根據當時一直在新亞求學的陳特的親證，指出1958年錢穆與唐君毅在新亞同舟共濟、情誼甚篤，彼此尚未有不融洽，更找到張君勱邀請錢穆聯署〈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及錢穆婉拒的原始信函，證明錢穆當時自陳與張君勱、唐君毅和牟宗三彼此論旨「十符其九」、「臭味相近，識者豈所不知？」³¹不能不說，無論是於理還是於據，劉述先的論證都是非常有力的。

這裏的關鍵在於，余英時將錢穆劃出新儒家之外，其標準並不基於文化立場和價值認同。然而，判斷是否「新儒家」，本應根據文化立場和價值認同來加以界定。就此而言，非但錢穆，余英時本人也當之無愧可以說是「新儒家」。他之所以既將錢穆劃出新儒家之外，自己也不接受新儒家的稱號，其實是因為不屑於和那些在他看來品行不足以當「儒家」之名者為伍。對此，有一次筆者曾當面向他請教：「余先生，您不願接受新儒家的稱號，是不是並不是因為您不認同儒家的基本價值和文化立場，而是不願意和個別以新儒家名號相標榜而品行不足以當之的人為伍呢？」他應聲而答曰：「當然。」當時的情景至今仍歷歷在目。因此，如果從文化立場和價值認同來判斷的話，錢穆和余英時都無疑可當「新儒家」之名。對於余英時在〈錢穆與新儒家〉中將「新儒家」

僅限於狹義的熊十力一派，劉述先回應說：「如取狹義，那我也不是新儒家。如取廣義，不只我不否認自己是新儒家，就是英時兄，儘管在主觀上抗拒這一稱號，就他對中國文化價值的肯定而言，也有充分的理由被稱作新儒家」，「由這個觀點着眼，錢先生與英時兄都是當代新儒家的中堅人物。儘管英時兄不喜歡這樣的稱號，套一句大陸流行的用語來說，只怕這不是個人的主觀意志可以轉移之事」³²。這一理解，恐怕是很多人都會認同和接受的。

事實上，余英時並非不知道這一點。他在〈錢穆與新儒家〉一文中對新儒家的不滿，更多地並不是指向熊十力、唐君毅和牟宗三這些所謂第一、二代新儒家。他曾不止一次親口說唐君毅和牟宗三是有真信仰的人，並一再稱讚牟宗三「瀟灑、率真」。牟宗三1995年4月12日去世翌日，劉述先便收到余英時一封傳真的信函。其中，余英時這樣寫道³³：

弟能為新儒家作一「諍友」，亦未嘗不好。前文未說新儒家的正面貢獻並不表示弟存純否定的態度。……驚悉牟先生逝世，弟聞訊後甚為悲愴。回想唐、牟諸先生自1949年以來之苦心宣揚並發揮儒學，為中國文化留一線命脈，其精神之可敬佩，人所共見，弟亦何能視若無睹。弟於牟先生之淡泊自甘、胸際如光風霽月，一向很敬重，此兄所素知。牟先生既逝，老成凋謝已盡，此下恐再難復觀此等可敬愛的典型人物矣。

這段話寫得情真意切，發自肺腑，絕非敷衍客套之詞。而「此下恐再難復觀此等可敬愛的典型人物矣」一句，既表達了余英時對牟宗三辭世的傷感之情，無形中也流露出他對牟宗三之後新儒家人物的某種看法。至於余英時自己一生所做的工作，單單就其卷帙浩繁的那些著作而言，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又何嘗不可以說同樣是「為中國文化留一線命脈」呢？

筆者之所以不嫌費詞要討論余英時撰寫〈錢穆與新儒家〉的相關意義，關鍵是要指出一點：要分析和理解唐君毅和余英時之間的關係，除了充分掌握兩人之間的交往之外，還要把他們的關係放在文化立場和價值認同這一更大的脈絡之中和背景之下予以觀察和分析。如此才能不至於一葉障目，被一時一地的事件所限。

而如果從文化立場和價值認同來看的話，借用余英時自己常用的一句話，唐君毅和余英時之間完全可以說是「所異不勝其同」的。他在給唐君毅的輓聯中所謂「道本同歸」的正說以及「我豈異趣」的反問，昭告世人的不正是他們兩人本是「同道」嗎？在這個意義上，對於唐君毅和余英時一生的關係，新亞改制風波所造成的誤會和遺憾，不過是一個短暫和小小的插曲。從大處着眼的話，就「1949年以來之苦心宣揚並發揮儒學，為中國文化留一線命脈」來說，余英時絕不僅僅是唐君毅等新儒家的「諍友」，更可以說是同氣連枝、並肩作戰的「戰友」。

唐君毅和余英時畢生念茲在茲的，都是如何在中西文化的交匯與激盪中一面吸收西方文化的優良成份，一面立足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在中西文化

雙向批判與吸收的過程中，使中國在步入現代文明社會的同時，保有並發揚傳統文化中值得向世人推薦的精神價值。就此而言，在中國「浴火重生」這一至今仍處在進行時的歷史過程中，雖然唐君毅和余英時各具風采，但又何嘗不可以說他們和錢穆一樣，堪稱「一生為故國招魂」的中華士人呢？在為唐君毅銅像所寫的銘文最後，余英時所謂「明道救世，上承前哲；肫肫其仁，垂範後昆」^⑭，固然是對唐君毅的描述；而在余英時也已駕鶴西去的今天，從我們後輩的角度來看，這句話不也可以說正是余英時自己的寫照嗎？薪火相傳，不絕如縷。唐君毅和余英時，正是中西文明交匯大道上的兩位行路人和引路人。（本期續完）

註釋

- ① 唐君毅：《日記》，上、下冊，收入《唐君毅全集》，第三十二、三十三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
- ② 唐君毅3月22日的日記記載：「廿二日 晴 上午與余英時、全漢昇及一學生各一槓。」參見唐君毅：《日記》，下冊，頁182。
- ③ 之所以說「仍然偏重」，因為港英政府建立中大的初衷，是在以英文為教學和工作語言的香港大學之外，於香港成立以中文為教學和工作語言的第二所大學。雖然名為「中文大學」，英文仍然成為其官方語言，以至於是否掌握英文變成一種等級的標準。
- ④ 余英時口述，李懷宇整理：《余英時談話錄》（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21）。
- ⑤ 劉述先曾記兩人初次見面是在1969年美國的一次會議中。不過，劉述先去世時，余英時寫的紀念文中，提到那次會議兩人初見的時間是1968年。參見余英時：〈悼念老友劉述先兄〉，載《劉述先先生紀念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2016），頁5-10。當年會議一事，余英時的記錄比較詳細，故兩人初次見面的時間似當以余英時所記的1968年為準。
- ⑥⑧⑩ 劉述先：《傳統與現代的探索》（台北：正中書局，1994），頁100；100；120。
- ⑦ 余英時：〈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載《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4），頁129-64。根據《中文大學校刊》的記錄，除了8月23日的講演之外，余英時25日還有一個「漢代的社會」的講演（參見《中文大學校刊》第8卷第2期〔1971年9月〕，頁5），這應該就是上述唐君毅《日記》25日當天所說的「茶會」內容。也許未必是和23日的講演一樣正式，所以唐君毅稱為「茶會」而非「講演」。
- ⑨ 「我們的心永遠在那一邊」，可以說正是余英時生前時常提起的「中國情懷」的表露。參見彭國翔編：《中國情懷：余英時散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 ⑩ 和余英時差不多同時到新亞、曾參與改制並在後來長期擔任中大哲學系主任的劉述先，也是唐君毅一手引進的。
- ⑪ 根據《中文大學校刊》的記錄，余英時報告的內容是美國大學之中國學術研究近況。參見《中文大學校刊》，第9卷第1期（1972年9、10月），頁6。
- ⑫ 此事筆者也曾親耳聽余先生談起過，那是2007至2008年筆者在哈佛訪問期間的一次電話長談。僅就此事，余先生便足足講了至少二十分鐘。還記得他最後語帶詼諧地說：「我是經過權力的考驗的。」
- ⑬ 根據《中文大學校刊》的記載，余英時7月16日抵港，27日在新亞書院舉行了校長職務移交典禮，8月1日正式就任新亞校長，10月18日起擔任中大副校長（任期兩年）。值得一提的是，9月28日新亞二十四周年校慶、孔子誕辰及教師節慶典，由余英時主持，時任新亞研究所所長的唐君毅做了演講。參見《中文大學校刊》，第10卷第1期（1973年8月），頁8；第10卷第2期（1973年9、10月），頁2、9。

- ⑭ 唐君毅 1974 年 5 月 18 日日記記錄：「十八日 晴 上午至研究所與學生談，下午與哲學系學生於圓亭聚會，晚同學宴我與宗三兄退休。」參見唐君毅：《日記》，下冊，頁 254。
- ⑮ 1974 年 9 月 8 日日記載：「在台北為新亞研究所事與教育部接洽恢復對所中畢業生之學位之承認。」參見唐君毅：《日記》，下冊，頁 262。唐君毅夫人謝廷光 9 月代筆的《日記》17 日載：「十七日 午前台大校長閻振興及程先生來訪，中午教育部長蔣彥士約，並告新亞研究所事已有一圓滿解決辦法，此乃此行之重大收穫。」參見唐君毅：《日記》，下冊，頁 263。
- ⑯ 唐君毅當天的日記記載：「十八日 晴 至研究所辦公，抄文三千字，下午研究所董事會開會，決定聘請宗三、復觀、士選為研究所專任研究教授。」參見唐君毅：《日記》，下冊，頁 279。
- ⑰ 唐君毅：《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 ⑱ 余英時：〈唐君毅先生銅像贊〉，載《情懷中國：余英時自選集》（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0），頁 233；〈唐君毅先生像銘〉，載謝廷光等：《紀念集》，下冊，收入《唐君毅全集》，第三十八卷，頁 470；〈輓唐君毅〉，載《余英時詩存》，收入《余英時文集》，第二十八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2），頁 196。
- ⑲ 劉述先拒絕接掌新亞事，在余英時紀念劉述先的文章以及劉述先自己的回憶中都有明確的記載。參見余英時：〈悼念老友劉述先兄〉，頁 7-8；劉述先：《傳統與現代的探索》，頁 119。
- ⑳ 余英時：〈輓唐君毅〉，頁 196。唐君毅《紀念集》中收錄的輓聯為「莫哀花果飄零，道本同歸仁為己任；終至人文成化，我豈異趣久而自傷。」參見謝廷光等：《紀念集》，下冊，頁 627。但《唐君毅全集》2016 年簡體版王康序文中所引輓聯（見於《唐君毅全集》，第一卷，頁 76），則和《余英時詩存》中的一樣而與《紀念集》不同，所以本文以《余英時詩存》所收文字為準。
- ㉑ 李懷宇：《余英時訪問記》（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22），頁 213。
- ㉒ 劉國強：〈對於君毅師的幾點深刻感受〉，載謝廷光等：《紀念集》，下冊，頁 434。
- ㉓ 劉伍華：〈悼唐君毅老師〉，載謝廷光等：《紀念集》，下冊，頁 461。
- ㉔ 參見王邦華：〈含糊曖昧的中大理念、朝三暮四的大學體制〉，載王邦華等編：《中大五十年》，上冊（香港：中大五十年編輯委員會，2015），頁 18-20。
- ㉕ 當時身為哲學系主任兼講座教授的劉述先，由於支持改制，則被視為小叛徒。參見劉述先：《傳統與現代的探索》，頁 264。
- ㉖ 余英時：〈唐君毅先生銅像贊〉，頁 233；〈唐君毅先生像銘〉，頁 470。
- ㉗ 余英時：〈血淚凝成真精神〉，載曹永祥等編：《徐復觀教授紀念文集》（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4），頁 115-17；〈追憶牟宗三先生〉，載彭國翔編：《師友記往：余英時懷舊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頁 107-12。
- ㉘ 余英時：〈錢穆與新儒家〉，載《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台北：三民書局，1991），頁 31-98。
- ㉙㉚ 參見劉述先：〈對於當代新儒家的超越內省：上篇：理學、經學與史學的融通——由方法學的觀點論「錢穆與新儒家」〉，《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5 卷第 3 期（1995 年 9 月），頁 1-46；22、45。
- ㉛ 錢穆：〈答張君勳先生論儒家哲學復興方案函〉，《再生》，復字第 1 卷第 22 期（1958 年 7 月 16 日），頁 8。
- ㉜ 劉述先：〈悼念牟宗三先生〉，載《當代中國哲學論：人物篇》（River Edge, NJ：八方文化企業公司，1996），頁 199-200。
- ㉝ 余英時：〈唐君毅先生銅像贊〉，頁 233。